

● 文学研究

**编者按:**文学是人的符号性存在。因此,文学研究离不开哲学的指导(张冰);它具有历史性,因此须要从历史维度考察与反思文学研究(荣洁);文学是人的精神家园,现实主义与神秘主义在这个家园中共现与共存(于明清);不同民族的文学产品须要通过翻译实现传播,此时注释往往十分重要(王加兴)。4篇文章凸显出我国文学界对俄罗斯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两性是人学的基本主题,如何通过处理两性关系实现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和谐,是须要探索的又一文学主题(甄艳华)。

## 巴赫金:对话主义与辩证法\*

张 冰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875)

**提 要:**在对巴赫金对话主义的讨论日益深入的今天,一个长期以来没有明确结论的问题势必会进一步引发我们思考:那就是巴赫金对话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存在明显的矛盾。一方面,有人认为巴赫金与辩证法无关;另一方面,则又有人认为有关。观点的分歧主要取决于一点,即我们是否把早期出版的署名为别人的三部主要论著当做主要出自巴赫金手笔的著作。我们认为,巴赫金对话主义与辩证法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最主要的论据就依托于后一种观点。另外,巴赫金与辩证法的深刻关系还可以采用内在论的方式予以证实,即它们都根植于语言本身所体现的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统一规律。搞清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巴赫金对话主义的理论内涵无疑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关键词:**对话主义;辩证法;巴赫金

**中图分类号:** I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0)05-0122-4

### Bakhtin: Dialogism and Dialectics

Zhang B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The relations between Bakhtin's dialogism and dialectics is the question that should be resolved as the urgent task in the literary scholarship today. The contradiction of the differences of standpoints depend on whether the "disputed texts" belong to Bakhtin or not.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firmly believes that the Bakhtin's dialogism is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dialectics in the sense of the opinion that these "disputed texts" are actually written by M. Bakhtin. The author of this paper also insist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connotation of M. Bakhtin's dialogism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tudy of M. Bakhtin.

**Key words** dialogism; dialectics; Bakhtin

在后巴赫金时代的今天,与巴赫金理论有着渊源关系的社会语言学和话语分析,在国际语言学界已经成为研究语言学的一把利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构成它的灵魂与核心的是辩证法。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按照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表述,辩证法是“最高的

思维形式”(马克思 1972:416)。而在列宁那里,辩证法更是“革命的代数学”(列宁 1973:244)。然而,语言学的历史究竟能否证实这一理论假说呢?把巴赫金对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联系起来,于我们有何依据?二者的共同特征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论证的问题。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于语言的本质特点和社会特征的高度尊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巴赫金《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研究”(06BWW004)的阶段性成果。

重, 涉及到作为思维表征的语言的一个根本规律——辩证法。辩证法既是思维规律, 也是语言规律。从根本上说, 这两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 是彼此同一的关系, 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

如果采用学术界的共识而把《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当做主要出自于巴赫金大脑的著作, 那么巴赫金拥护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昭然若揭。反之, 只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巴赫金固有的理论并未超出狭义“诗学”的范畴。(Cary 1990 119) 巴赫金所谓“社会学诗学”, 就是把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的形态。他写道, “应当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基础上制定适合于所研究的意识形态创作特殊性的统一的社会学方法的标准, 以便这个方法真正能够贯彻于意识形态结构的一切细节和精微之处”(巴赫金 1998 109)。巴赫金的对话主义不但强调语言的社会性(语言的交际本质), 而且认为真正的诗学应当具有社会性特征, 应当以辩证法为指导。“只有辩证唯物主义可能成为这个基础。”(巴赫金 1998 112)

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辩证法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中得到证实。这位托名为沃洛希诺夫的著作采用的论证方法, 是典型的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辩证思维模式: 正、反、合三段论法。作者先是提出一种正题(波捷勃尼亚式的“个人主义的主观主义”), 然后提出反题(索绪尔式的抽象客观主义), 最后用合题(综合)对前两者加以扬弃。诚如米·加德纳所指出, “这一批评策略的整体目标是通过有关特定理论的两种截然对立观点的质疑, 进而通过辩证协商和综合的方法克服双方各自的缺陷”(Gardiner 1992 10)。“我们认为, 这里, 就像到处一样, 真理不存在于金色的中间地带, 不是正题与反题之间的折衷, 而是在它们之外, 超出它们, 既是对正题, 也是对反题的同样否定, 也就是一种辩证的综合。”(巴赫金 1998 431) 此处, 巴赫金说的不是折衷, 而是一种扬弃。

应当指出, 巴赫金的这种思想多少带有一定的“反叛性”。也就是说, 这种“辩证的综合”思想不属于俄罗斯固有的思想传统, 而是一种在俄国背景下绝对具有创新性的思维。在俄国, 二元对立或所谓双重性早已成为俄罗斯思维的一个根本特征。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俄罗斯文化的隐秘结构是一个二元对立系统。我们常说的俄罗斯文化中有一个“隐秘的十字架”, 就是这个意思。造成俄罗斯人心性和俄罗斯文化的二元对立性的根本原因, 在于俄罗斯人的信仰系统, 即俄罗斯人的信仰是基督教-东正教和民间多神教结合的形态。不但如此, 俄罗斯文化中还始终贯穿着东方与西方、上层与下层的隐秘对立和长期斗争(而信仰上的双重性也与之相互交织)。在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系统的左右下, 俄国文化多文化极端主

义和所谓最高纲领主义: 不是左就是右, 不是革命就是反动; 不是上就是下, 不是红就是黑……这样一些对比鲜明的格局。

这一点大概是中俄在思维方式上的最大差异。无论如何, 中庸以及“真理存在于两造之间”如果不是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 也是一个重要特征。“我们现在说中庸, 就是能够中和的中庸之作用。我们中国文化中《易经》的道理, 是说天下的事物, 天下的人物, 随时随地在变, 每秒钟都在变, 没有不变的事。如何能适应这个变, 如何能领导这个变, 这是学问的中心。同时《易经》告诉我们, 变是对立的变, 任何一件事都是相对立的, 有正面必有反面, 有好必有坏, 你说对的, 同时也就产生了不对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在这个相对的中间, 有一个中和的道理。所以, ‘中庸’便提到中和的作用, 孔子是说两方面有不同的意见, 如果有最高的领导德业的人, 使它能够中和, 各保留其对的一面, 各舍弃其不对的一面, 那就对了。那才使‘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孔子同时感叹说: ‘民鲜久矣。’一般的人, 很少能够善于运用中和之道, 大家走的多半都是偏锋。”(南怀瑾 2005 306)

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 俄罗斯文化不承认“中庸”是有价值的。俄罗斯的地理位置似乎也助长了这一固有的思维传统和倾向: 她的气候不是冷就是热, 很少出现不冷不热状态。在俄罗斯文化中不冷不热即使不是“另类”, 也是足够“怪异”的。这在一系列俄罗斯文化著作中看得很清楚。然而, 作为俄罗斯文化传人的巴赫金却不然。在俄罗斯文化史上, 巴赫金是个“异类”和“异数”: 他不属于任何特定流派, 却综合许多流派的根本特点; 他本身就是文化综合现象, 把文本和个性统一在一起。但在这个核心问题上, 巴赫金思想与传统俄罗斯文化形成尖锐矛盾。总之, 在俄罗斯文化的宏大背景下, 巴赫金的思想 and 俄罗斯固有的思想传统相抵触。

而且, 巴赫金对话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也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巴赫金的“夫子自道”。在鲍恰罗夫等人的访谈录里, 巴赫金一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巴赫金的这一声明, 必须分析。问题在于: 当巴赫金说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时, 他指的是哪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 世界上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马克思主义。值得注意的是, 连马克思自己也郑重声明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把自己形形色色的马克思主义划清界限, 可见对于当时人们的种种阐释, 马克思自己并非全部认同。同样, 写作《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巴赫金, 也不认同当时人们信奉的所谓的马克思主义, 而只承认和认同他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等著作中阐释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观。这样, 问题就清楚了: 巴赫金说的马克思主义指他在《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中所批判的庸俗社会学。

庸俗社会学在苏联文艺学界造成了极大恶果,巴赫金到晚年仍对它耿耿于怀。这就是他所谓“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含义。

另外,巴赫金不承认“辩证法”,而只认可他标举的对话(主义)。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不能迷失于具体术语的表面差异,应当深入探究对话(主义)和“辩证法”的实质内涵。众所周知,巴赫金在他的大半生中,多数时间并不能畅所欲言,不得不诉诸于一种伊索式的语言。事实上,在俄国文学史上采用这种伊索式语言的已然不是个别现象或作家个人的风格,而是俄罗斯文学的一种整体风貌和根本特征。这种不得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情形,我们在巴赫金的许多著作中都不难发现。克拉克和霍奎斯特在其著名评传中指出,巴赫金作品大多有一种复调式结构:显在和潜在、外现与潜流、潜台词或双主题的存在,也都说明巴赫金著作的复杂性。对话和辩证法的情形也是如此。就起源说,对话与辩证法同出一源。“辩证法出自对话”(巴赫金 1998 380),它们在西方都源于柏拉图的对话录。柏拉图首创通过对话来发展思维的方法,所以在柏拉图那里,对话和辩证法是同义词。和以上情形一样,巴赫金这里公开表示反对的是在苏联哲学家手中被任意玩弄的所谓“辩证法”,而不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的辩证法;是指苏联时期被人们玩弄于股掌之中,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实际上常常堕落为诡辩术和相对主义的辩证法,而非黑格尔-马克思式的辩证法。

## 二

但巴赫金对于辩证法的吸收和应用,并不只限于宏观理论层面。其实,他的“对话主义”在细节方面也贯穿着辩证思维的特征。把它与中国传统思维对比,将会给理解这个问题提供十分有益的视角。

在中国,辩证法自古以来就是我们祖先总结出来的思维规律和法则。最古老的典籍《易经》就以辩证思维见长而成为群经之首。而且,中国式辩证法的历史远比其西方变体更加源远流长。在比较中西哲学思维共有的辩证法这一范畴时,南怀瑾先生指出,“西方文化中妇孺皆知的黑格尔辩证法——‘正、反、合’是举世闻名的。所以有许多人谈到《易经》时,说我们的《易经》真了不起,和黑格尔的辩证法‘正、反、合’完全一样。这是中国人的悲哀!我说,老兄!我们《易经》是五千年以前的产物,黑格尔几时才发明辩证法?为什么把我们老祖宗的东西,拿来与西洋人比,还说同他一样?这等于在街上看到祖父拉着孙子走,说祖父长得像孙子,而不说孙子长得像祖父”(南怀瑾 2005 193)。辩证思维在我国源远流长,并且构成中国哲学思维的根本特征。

老子的思想就充满辩证法因素。矛盾的二元对立相

反相成,对立统一观念渗透在《道德经》的字里行间,成为中国思维的基本原则。老子这种尚“中”的辩证思想“注意维护总体生命的和谐统一,避免矛盾的极端化而走向事物的反面”(王岳川 1998 16)。世上万事万物既对立又统一,在对立中存在、发展。离开对立统一原则,万事万物就会失去存在根基。因此,在谈论任何事物时都不要忘记把讨论的问题放在辩证统一的语境中来考察。

辩证法规律的最重要内涵是对立统一原则。世界上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矛盾是事物的普遍规律。只谈对立而不谈统一,就会割裂事物的整体性,走向相对主义。“有一个深入人民意识的辩证法的古老命题:两极相通。”(马克思 1972 472)也就是说,貌似相互对立的两极并不一味对立,而是可以相互转化,并且相互对立的很可能原本就是一种东西。也许,这就是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事实上,事物既对立又统一的特点最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因为语言也是事物的一种,区别仅仅在于它带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属性。这一思维的根本规律在语言细胞中就可以找到,这就是巴赫金所谓的“一语双声”(Дву-голосо́е)。话语的本质在于交际,而交际至少必须具备两个主体。即使在两个人组成的社会里,也有话语存在。对话的双主体性决定话语的意识形态对话本质,话语因此成为意识形态角逐对话的“语义场”。在话语交际中,即使对话双方使用相同话语,其赋予相应语词的内涵也截然不同。

巴赫金指出,“在话语中,在每一个表述中,无论它多么渺小,心理和意识形态、内部和外部的这一生动的辩证综合总是一次又一次地在实现着。在每一个言语活动中,主观感受就消失在所说话语-表述的客观事实之中,而所说话语在应答的理解中被主观化,以便或早或晚产生出回话。正如我们所知,每一个话语都是各种社会声音混杂和斗争的小舞台。个体口中说出的话语成了社会力量之间生动的相互影响的产物”(巴赫金 1998 386)。

如上所述,巴赫金是以话语为基点展开其理论演化的。但如果再细分一下,则不妨说他是从“一语双声”现象开始其探索历程的。“一语双声”经巴赫金指出以后,我们发现,它在日常生活话语中无处不在。最平常的便是所谓“一语双关”和“指桑骂槐”一类现象。

语言是思维的表征。离开语言不可能有思维,思维寓于语言之中。思维通过语言、在语言中进行。因此,语言的特征往往也是思维的特征,意识的特征。在这个问题上,巴赫金与中国文化思想可谓如响斯应,若合符契。这是不是俄罗斯文化的东方性在这位思想家身上的表现,我们无法贸然断言。但巴赫金仰慕中国文化却是事实。如果从语言及意识包含的辩证思维入手,就会发现,巴赫金与中国文化的共同点大得出人意料。钱钟书在

《管锥编》中对“欧洲中心论者”的始作俑者黑格尔颇有微词:“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辩;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拉丁文中亦无意蕴深富尔许者。其不知汉语,不必责也;无知而掉以轻心,发为高论,又老师巨子之常态惯技,无足怪也;然而遂使东西海之名理同者如南北海之马牛风,则不得不为承学之士惜之。”(钱钟书 1979: 2)钱先生对黑格尔的批评是中肯的。黑格尔的要害就在于不懂中国文化(包括语言)却敢放言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鲜明体现在她的语言机制中。文字是一种民族文化的身份证和基因。在优美而又丰富的古代汉语中,“以相反两义融会于一字”的现象比比皆是。如“武”字,《说文》说“止”“戈”为“武”,这是把相反对立的两个意思融合在一个字里的例子。又如,老庄哲学中频频出现的核心概念之一——“无为”,在实际语境中常常是“无不为”之意。(南怀瑾 2005: 706)“关雎之乱”:“古代的‘乱’字含有‘乱’的反面意义在内,就是‘治’的意思——秦汉以上的书,会这样用,唐以后大多都不会这样用。比如‘毒’字,在秦汉以前,有治疗,痊愈的意思,譬如有人砍了我们一刀,是伤害;而我们那手上或脚上生了疮,医生锯下我们一条手臂或一条腿,就不算伤害,反要感谢他的治疗,就是这个道理。因为古代文字少的时候,就有许多字义是借用的。”(南怀瑾 2005: 408)事实上,此类例子在古汉语中俯拾即是。

俄语也不乏此类现象。如俄国著名歌剧《Жизнь за царя》中,жизнь(生命、生活)的实际语义为 умереть(死)。“生”之极限为“死”,因此二者可以分训而不悖,一词而二义兼。

此类语言现象的旨趣在于“双关性”:语义似乎模糊、难以捕捉,只有紧扣上下文,才能确定其含义。实际上,它们的“依违两可”不是无条件的,因此和相对主义有本质不同。

“一语双声”运用得当,常常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下这个例子选自《作家文摘》。作者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最激烈之际,为了拯救沦入造反派手里、生死悬于一线

的常书鸿,利用语言“双关意义”与造反派巧妙周旋,终于从危难中拯救了这位敦煌学家生命的故事:

次日一早我赶到医院,运用我的特殊战略,冒充“革命小将”,向医生展开了一场“阶级斗争”。我尽量装着蛮横地训斥他:“你看看你开的这个方子,要阶级敌人‘卧床休息’,像什么话,能办得到吗?你也知道常书鸿是什么人,三反分子、汉奸、走资派、牛鬼蛇神。要他‘休息’,不斗争他,革命群众能答应吗?”几句硬话下来,可怜的医生给我打懵了。他看着我,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要是知道怎么办就不来找你了,你必须想出一个至少坐着也得开他的斗争会的办法来。他说,那就配一副钢背心好了,我也没别的办法了。我听了暗中大喜,我得承认,这是我一生干过的“最革命”的一件事。(萧默 2008: 11)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即使是人道主义的救助措施也得披上一件最最革命的“外衣”,拯救常书鸿也不例外。

巴赫金对话主义的效用可见一斑。

#### 参考文献

- 巴赫金. 巴赫金全集 [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8
- 列宁. 列宁短篇哲学著作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马克思.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南怀瑾. 论语别裁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5
- 钱锺书. 管锥编 [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9
- 王岳川. 《道德经》英译本序 [Z].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8
- 萧默. “祁连山下”之外的常书鸿 [J]. 作家文摘, 2008年1月11日.
- Cary SaulM orson and Cayl Emerson. *Creation of a Prosaics*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MichaelG arliner. *The Dialogics of Critique M. M. Bakhtin and the Theory of Ideology*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2

收稿日期: 2010-02-13

【责任编辑 李凤琴】